

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

(民族社会学连载之三)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4)01—0020—25

● 马 戎

[摘要] 语言文字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众日常交往的工具，从而一定程度上成为族群的象征和标志，其使用情况可以反映族群之间的关系。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我国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所体现的族群关系状况，并结合学校教学语言的使用，讨论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模式和发展趋势。

[关键词] 语言；族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在人类社会各个族群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语言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是学术界的共识，如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认为：“族群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族群）并凭借文化方面的一个或几个差别（如宗教、习俗、语言或组织）来相互区别。”（Smith, 1991: 20）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把语言和宗教同视为族群文化认同的基本要素。（Parsons, 1975: 54）各国许多学者都把共同语言作为族群的主要文化特征之一，当年斯大林也把语言作为定义“民族”的四个特征之一。

由于世界各地的人类族群起源是多元的，因此人类语言的起源也是多元的。各个族群在其语言萌生的初期，在发声方法方面很可能受到自身周围环境中其他声音（动物、自然气候声音等）的影响。^①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不同的动物和自然界声音，处在不同自

^① 如白居易在诗中这样形容他所居住的湓江地区：“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然环境中的人类族群也会模仿不同的发音,萌生不同的语言,创造出不同的书写文字。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本族群发展的历史和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前进的轨迹,并将其作为本族的历史记忆保存下来。各族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发音方法、词汇构成、语法规则、书写方式也各有特点。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们根据语言词汇和语法结构来分析和研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上万种语言,这种方法被称为语言谱系方法。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被划分为14个语系,语系下面又分为不同的语族,语族下面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语支。^①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是使用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和文字,在族群成员内部并与其他族群进行各种信息的交流。

由于语言文字既是各个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民众在现时日常生活中进行相互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现状或分析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语言变化的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在本文里,我们将讨论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功能,考察语言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族群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介绍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在语言方面的主要观点和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介绍语言调查在族群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最后结合教学语言讨论少数民族教育的有关问题。在我们具体讨论语言使用调查方法和研究案例之前,首先介绍民族语言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分析语言与族群关系的部分文献。

一、语言具有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的双重性

语言是人们相互进行口头交流的工具,词汇的本身即包含了文化的丰富内容,^②而文字则记录下了人们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知识、智慧与成就,并通过各类文本记录和印刷品向下一代传递并介绍给其他族群。正是因为人类在交流中需要沟通信息的工具,才由此而产生语言。所以从语言产生的原因和产生之后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最重要的性质就是它作为记录和传递信息工具的应用性。

但是,文字一旦出现之后,它作为族群的历史事件的记载工具和文化传统的象征,也成为各个族群历史和族群文化的基本载体。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中,各族群都以用本族文字记录下的历史和其他文化结晶(史诗、文学作品、历书、工艺等)而自豪,所以人们通常把族群语言的前途,看作是族群传统文化的前途,对本族语言寄予了深厚的感情。

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都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控制的行政疆域内推行自己的语言,使它成为通用语言或“国语”,只是在具体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

^① 这14个语系是:印欧语系、闪含语系(亚非语系)、高加索语系、达罗毗荼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楚克奇—堪察加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科伊桑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宁骚,1995:60)中国主要族群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有的文献把世界上的语言归类为17个语系。(卡瓦利—斯福札,2000:222)

^② 用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幽默,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可能变得索然无味。从这一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文化的差别与语言之间的密切关联。

同而已。这样既便于行政管理,也有利于在文化上对其他族群实行同化。而处于劣势的族群,也必然试图极力保存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①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族际相互竞争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是各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象征与载体,也是族群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重要文化特征,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寄托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

正因为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对待语言使用的选择时,面临着把它在感情上看作是“文化象征”和在理性上看作是“交流工具”这样一种双重性,前者注重族群以往的演变历史和文化价值,后者注重族群成员在目前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机会。在社会学对于语言的研究中,需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目前国内关于民族语言问题的讨论中,关于“文化象征”这一方面强调得很多,对于“应用工具”这一方面则讲得相对较少。而忽视了语言功能的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对于语言的认识就有可能偏向于感性化,做出脱离实际的判断。例如在“伪满洲国”时期,日伪政权“曾经努力鼓励使用满语,认为这样将使满族民众获益,但是因为得不到满族民众的支持,这一尝试最后被放弃了。”(Dreyer, 1976: 20)这个例子说明在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满族与汉族在文化以及语言方面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融合,满语已经失去了继续使用的实际价值,再去恢复使用满语是违反社会发展大潮流的。

随着族群之间、各国之间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的不断加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特质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一种最通用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该国的正式“国语”或非正式的“族际共同语”。在国际交流迅速加强和“全球化”进程的客观需求下,也会出现一种或几种人们最为常用的“国际共同语”或跨国界的“地域共同语。”^②

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就全国而不是某一个小地域来看,应用性最强、最普遍的语言是汉语。由于有一些族群(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畚族等)的绝大多数以汉语为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蒙古、藏、壮、撒拉、苗、瑶、东乡、土、保安、羌、佤佬、白族等)人口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干部群众通用汉语,其他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大部分通晓汉语,汉语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公共语言”或“族际共同语”。所以不能根据名称和历史上的情况简单地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只是“汉族的语言”。

在我国,不但历史上和近现代的大量文化典籍和科技成果是用汉文出版,国外的大量文学、科技著作是译成汉文出版,连国内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也是用

^① 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德国占领区法国学校的师生对于法语的真挚感情和占领军的语言政策。在《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吞并了朝鲜,禁止朝鲜人使用本族语言文字,而许多朝鲜人仍然坚持秘密学习自己的文字。

^② 如目前在国际外交界、学术界、商界所通用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世界上也仍然存在一些区域性共同语言,如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区域内俄语是主要交流和工作语言,西班牙语仍然是拉美洲各国之间的主要交流语言。

汉文发表出版的。^① 在我国每年的出版物中,有99%是汉文出版物。^② 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人,如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文,就意味着可以接触和使用国内信息总量的99%,这是数量巨大和无法替代的资源。掌握这些资源,对每个人的发展(当然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和个人所就业的机构单位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汉语,不仅仅可以同汉族交流,也可以通过汉语与其他很多族群交流。如果说今天人们学习了英语可以走遍世界,那么在中国学习了汉语就可以走遍全国。掌握了汉语之后,交流的范围甚至可以超出国界,中文是联合国五种法定工作语言之一,所有文件都有中文本。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之外,在世界各国还生活着大约两千五百万华人,国外许多大学开设中文课程,那些研究中国并与中国交往的外国政治家、学者、科学家、企业家、记者所学习的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普及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事。^③

同样的语言使用演变过程也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各国通用的语言曾经是拉丁语,近代欧洲通用的语言曾经是法语,在非洲大多数地区曾经是斯瓦西里语。在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跨国界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时期,在世界上(或“全球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也会出现一种最通用的语言,作为非正式的国际共同语以发挥其“实用性交流工具”的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越来越显露出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头。而在此之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与英语相比,在其他国家和殖民地中同样有着相当的影响。这些欧洲语言都拥有自己辉煌的发展历史、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④ 但是,当各国之间的交流迅速增长之后,必然出现了对一种通用语言的客观需求。当时也有人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语”,鲁迅先生的一个俄国朋友爱罗先珂就曾在北京大学讲授“世界语”。但是没有自身的历史积累,没有一个国家作为政治后援,只凭几个学者文人创造和鼓吹的一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真正成气候的。与此同时,就在国际社会对于一种共同语言的客观需求下,英语凭借自身各方面的优势地位脱颖而出。

^① 这样可以显著扩大阅读者的数量,达到与其他族群和国外读者(主要学习汉文)进行交流的客观效果。

^② 例如1993年全国共出版图书96761种,发行593372万册,杂志7011种。其中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3500种,发行5090万册,杂志173种。(国家统计局,1994:62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国家民委经济司,1994:372。)

^③ 在汉族当中,同时存在着一个推广普通话的问题。各种方言历史悠久,与地方文化和戏曲结合起来,使人们对它们也带着很深的感情因素。但是社会发展必然会推动普通话的普及,因为不学习普通话的人在未来的发展机会无疑将受到许多限制。语言的应用性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也将使得各种方言的“地盘”逐渐缩小并最终消失。

^④ 应当说,这些语言都很优美并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法语文学大师有巴尔扎克和雨果,德语文学大师有歌德和席勒,俄语文学大师有托尔斯泰和普希金,英语文学大师有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西班牙语文学大师有塞万提斯,等等。

英国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与南亚各国、新加坡、牙买加、南非以及非洲的前英国殖民地等等)拥有辽阔地域、庞大人口与逐步增长的经济实力,这使得英语的流行具有坚实的人口与政治基础。特别是二战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使得英语在国际经济活动、学术交流和外交活动中的“应用性”价值不断提高。战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处在绝对优势的地位,西欧和日本的经济重建依赖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美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性的外交事务中有着重要的发言权,英语成为各国经济贸易、外交活动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工作语言。除此之外,美国各大学每年对外国学生提供的上万名研究生奖学金吸引了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把英语选作学生的第一外语,“托福”考试点遍布世界,这就对各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语种构成带来重要影响。世界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正如亨廷顿所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上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亨廷顿,1999:49)^①

由于英语已经成为学术界和经济界最通用的语言,世界上科学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英文刊物上,任何国家若想及时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它们的研究人员必须能够熟练和经常阅读这些英文刊物。而要培养这样的科技人员,大学本科的理工科课程可能需要采用英语教学,这样学生到了研究生阶段才有可能流利阅读英文原著与期刊。文科的情况不如理工科那么紧迫,如果不阅读英文期刊,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就会自我封闭在世界知识体系之外,无法及时吸收世界各国的研究成果。学术界的这一发展趋势进一步证明了语言的工具性本质。

关于人类语言的未来发展,学者们也进行了调查和预测。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语言和历史学家发表的调研报告介绍,在1万年以前,世界人口约有一百万,存在着大约一点五万种语言,今天全世界人口增长到六十亿,语言种类却减少了一半,只保留了七千多种。有的语言学家们预计在今后100年内(在21世纪),还将会有两千三百种语言消失。^②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迈克尔·克劳斯教授则更为悲观,他认为地球上现存大约五千种语言,而在100年内人类将只剩下五百种语言,十分之九将要消失。^③专家们普遍认为,计算机的迅速普及将给世界各地的小语种带来更为毁灭性的打击,那些人口很少的小族群的年轻成员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去学习大族群的语言以及计算机软件所通用的英语,两至三代人之后,他们的传统族群语言将难以延续。这也证明了各族民众和各国社会将会越来越重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从而选择在交流中实用性最强的一种语言作为自己的主要学习语言。

① 据介绍,在今天全世界的广播节目中,60%以上使用英语,世界上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有3.5亿人,作为第二语言并经常使用的有3.5亿人,英语在七十多个国家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总人口为14亿,全世界学习英语的人有10亿,全世界四分之三的邮件用英语书写,全世界网站的78%为英语网站。(姜亚军,2002:64)

② 参见下世纪世界将有三分之一语言消失[N].参考消息,1997-09-27(6).

③ 参见参考消息,2001-11-13(6)。“很多语言现在只有几百人在使用,而且难逃灭绝一途,就像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消失的很多语言一样。”(卡瓦里—斯福札,2000:210)

正是由于看到了全世界语言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多族群国家内部实际正在发生的语言变迁，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或族群领袖在本族语言的问题上不是从狭隘的族群感情出发，而是看到任何族群的发展都必须顺应这一语言发展的大趋势，在语言学习问题上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

二、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

作为俄国革命的领袖和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的执政者，列宁和斯大林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对于“民族语言”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这些观点对于中国民族理论界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他们的主要观点加以介绍和讨论。

1. 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按照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这篇文章，族群语言的发展有几个阶段：(1)在存在族群压迫的历史时期，“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事实上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2)“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3)“这些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将首先划分出最丰富的单一区域性语言，然后区域性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各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和英语，而是吸收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斯大林，1950：557~558)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语言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民族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分析族群文化的特征和族群文化、族群差异的发展前景。在较早发表的《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斯大林直接把“民族语言”与“民族消亡”联系起来：“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本)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斯大林，1929：299~300)

但是，从近代许多国家的族群发展情况来看，随着人口迁移和族群之间混居与广泛交流，有一些族群虽然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而改用其他族群的语言，但这些族群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没有被同化，如中国的回族、满族已经通用汉语，但是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族群身份与认同。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已经使用当地的语言，但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族群身份。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语言这一因素外，其他因素(如宗教)在保持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方面，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回族和犹太人之所以有可能保持独立族群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与周围其他族群所信仰的宗教不同，这是他们与其他族群相互区别的关键因素。美国黑人的语言是英语，信仰的宗教也与白人相同，但他们仍是区别于白人的不同种族。体质差异、受奴役的历史和受歧视的现状是黑人保持独立族群意识的核心因素。我们承认语言对于族群的形成和族群认同的建立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需要指出，拥有独立的语言并不是保持族群意识的绝对必要条件。

2. 反对使用行政力量推行“国语”。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列宁对于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国语”的做法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样做只能引起持其他语言的族群的反感,在一个多族群国家中任何语言也不应拥有特权,经济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便利的语言成为公共语言,任何强制的效果适得其反。列宁特别强调要考虑在民族问题上显得特别重要的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只要是在稍微采取强迫手段的情况下,就会玷污和损害集中制、大国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并将这种进步作用化为乌有。但是,经济比心理状态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列宁,1913:253)首先我们要肯定,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共同的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也需要一个经济生产上能够分工合作降低成本的政治地理区域,语言的统一和建立版图辽阔的大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具有进步作用的,但是,语言使用方面的统一只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愿接受一个“族际共同语”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任何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曾经把共产党国家的语言政策归纳为“三阶段模式”: (1)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是“多元主义”政策,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受到鼓励,而对于使用占国家主导地位语言的官方压力只是间接的; (2)第二阶段为“双语主义”,政府增加了要求学习国家主导语言的要求,如自1938年开始,苏联各民族被规定并作为义务(compulsory)要去学习俄语; (3)第三阶段为“统一语言”,国家主导语言成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和官方正式语言。他同时指出,尚没有哪一个国家进行到第三个阶段,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政府的语言政策在这三个阶段过程中有时向前跳跃,有时急剧后退,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保持循序渐进;在同一个国家内,对待某一个族群的语言政策也可能与对待其他族群的语言政策并不一致。(Connor, 1984: 254~255)

以上这些观点十分值得我们思考,国内学术界过去对于一系列相关问题,如关于语言的“阶级性”问题,对于如何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对于是否应当推行“国语”的问题等等,都曾经有过争论,而且直至今日也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共识。语言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使得有关的学术讨论难以深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对于语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也必须开展下去。

三、各国的语言政策

在当今世界上,由于各国的族群构成和发展历史各不相同,在对待语言的使用方面,各国政府都根据各自的国情制定有自己的语言政策,有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本国的“国语”、“官方语言”和“通用语”,确定了一些语言在本国的法律地位,(哈经雄、滕星,2001:176)有的国家对“官方语言”之外的其他“非官方语言”的使用范围也有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定。

1. 美国的语言政策

“许多世纪以来,语言‘霸权’(Language Supremacy)和统治语言的‘纯净’(Purity)一度在许多土地上是权力斗争、国家和族群认同的焦点问题。”(Simpson and Yinger,

1985: 401) 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毫无例外地试图在自己所控制的领土上推行自己的语言, 使它成为“国语”, 只是推行时在强制的程度上, 各国政府的做法有所不同而已。

在美国, 关于语言方面存在三种政策: (1) 认为美国是一个使用一种语言的国家, 应用一种语言对每个人都有利, 所以应当对双语教学予以抵制; (2) 承认美国存在一些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或成人), 他们讲各自原来的母语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对于他们来说, 双语政策将会架起一座通往应用英语的桥梁; (3) 承认双语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现实, 而且这种现实对美国有好处, 在语言方面的多元化, 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是有必要的, 在一些人们不讲英语的区域, 其他语言应当得到某种官方的承认。(Simpson and Yinger, 1985: 401)

1968 年美国通过了《双语教育法》之后, 官方的语言政策大致是上面的第二种。但是由于财政资源、教育科目方面的考虑和对分离主义的担心, 一些州对于在学校里实行双语教育有分歧意见, 同时民众中抵制双语教学的倾向在上升。一些研究表明, 少数民族的学生由于母语不是英语而且没有能够及时强化英语学习, 在学校的课程学习中居于不利的地位。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 由于教师要照顾这些学习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而放慢进度或降低难度, 母语为英语的多数学生在学习上“吃了亏”。(Simpson and Yinger, 1985: 400)

表 1 1970~1980 年期间美国在家里讲不同语言人数的变化

家里使用语言	变化	家里使用语言	变化
德语	-15%	朝鲜语	+300%
斯拉夫语	-30%	菲律宾语	+120%
立陶宛语	-27%	汉语	+70%
俄罗斯语	-26%	阿拉伯语	+40%
依地(犹太)语	-25%		

资料来源: 罗贝, 1988: 150~151。

在美国 1980 年的普查中, 有 2300 万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对普查人员表示他们在家里不说英语, 其中 1100 万人讲西班牙语, 如新墨西哥州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讲西班牙语, 而在大城市中, 迈阿密市有 43% 的居民在家里不讲英语, 在纽约市居民中有 31% 的人在家里不讲英语。这次普查同时发现, 在家里不讲英语的成年人当中, 有 28% 完全不会英语。(罗贝, 1988: 147) 另外, 在 1970~1980 年期间, 在家里讲英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族群人数发生明显的变化, 欧裔移民讲非英语母语的人数在减少, 而亚裔移民在家里讲母语的人数在增加。(表 1)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在美国所占的相对比例。由于 70 年代以来亚裔新移民人数的迅速增加, 他们的到来明显增加了讲母语的人数。

2. 前苏联的语言政策

十月革命之后, 有人曾经建议宣布俄语为“国语”并强制推广其使用。对此列宁明确指出, 任何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广俄语的做法会适得其反, 强调各民族的语言必须受到尊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 在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本地民族的语言与俄语同属于官方

正式语言, 在学校里使用本地民族语言教学。在苏联建国初期, 政府“还为文字不健全或无文字的 110 种语言中的 50 种语言, 创造了文字。……在苏联时期曾用 94 种民族语言进行过教学, 1925 年俄罗斯用 25 种民族语言出版了教科书。”(哈经雄、滕星, 2001: 181)

我们在前面简单介绍了康纳(Walker Connor)对共产党国家语言政策演进过程所归纳的“三阶段模式”。他是这样来分析苏联的民族语言政策推行过程的: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第一个十年, 各民族被鼓励学习自己的语言, 并没有要求他们去学习俄语。

“甚至为那些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设立用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 ……在 30 年代初期这一政策开始变化, 使用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被限制在自治地区内, 而俄语教学的学校在全国迅速增长, 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之外的少数民族大多开始使用俄语学习。到了 1938 年, 斯大林规定全国所有学校都必须学习俄语。^①在随后年代里, 学校里开始学习俄语的年级逐步降低, 例如在亚美尼亚的学校里, 1938 年规定在初中开始学俄语, 1946 年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俄语, 1957 年小学一年级即开始学俄语。1958~1959 年是苏联语言政策的另一个里程碑。这一年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 居住在本族自治地区的非俄罗斯父母, 可以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去本族语言教学的学校或者俄语学校。”(Connor, 1984: 256) 考虑到使用俄语学习对于孩子未来接受高等教育和工作前途的积极作用, 许多父母送自己的孩子进入俄语学校。^②

在苏联,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在 1958~1972 年期间平均从提供 6.7 年教育降到 5 年, 如果把 14 个人口较多、可提供本族语言教育 10 年的加盟共和国除外, 那么其他 31 个族群可提供的本族语言教育平均从 5.2 年降到 2.74 年。14 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在苏联的语言政策中具有比较特殊的独立地位, 而其他民族的语言(大约有九十种)则逐渐处在弱化甚至消亡之中。在这 14 个加盟共和国当中, 苏联政府对于波罗地海三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 5 个国家的语言政策, 与其他 9 国相比又更为宽松。(Connor, 1984: 258~259)

根据苏联官方统计, 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推广俄语教学的做法也有所加强。在 50 年代的摩尔多瓦, 接受俄语教学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33%。(Connor, 1984: 260) 在 30 年代, 乌克兰有 86% 的学生用乌克兰语学习, 只有 4.5% 的学生接受俄语教学, 这两个比例 50 年代改变为 72% 和 26%, 60 年代又改变为 62% 和 37.2%, 70 年代为 60% 和 40%, 而 80 年代俄罗斯人只占乌克兰总人口的 19.3%, 所以有相当比例的乌克兰学生在俄语学校读书。(阮西湖, 1981: 53) 在苏联教育体系中, 学校年级越高, 俄语的使用程度也越高。表 2 表明非俄罗斯各族以俄语为本族语言的人数比例从 1959 年的 10.8% 增加到 1979 年的 13.1%。

^① “1938 年 3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通过了《关于在各民族共和国和州必须学俄语的决定》。”(哈经雄、滕星, 2001: 182)

^② 在理论上各个民族的语言居于平等地位, 但是对于不同民族而言, 使用本族语言教学所能够获得的学校教育的年数差距很大。(Connor, 1984: 257) 换言之, 有的民族语言教育系统只提供到初中, 有的提供高中, 有的提供大专或大学本科。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 一些人口少的族群, 没有设立使用本族语言教学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表2 苏联时期非俄罗斯人语言使用情况

	人数(万人)			%		
	1959	1970	1979	1959	1970	1979
非俄罗斯人总数	9471.3	11271.3	12468.8	100.0	100.0	100.0
以本族语言为民族语言	8297.2	9807.0	10680.0	87.6	87.0	85.6
以俄语为本民族语言	1018.3	1301.9	1630.0	10.8	11.6	13.1
以其他族语言为本民族语言	158.8	161.5	160.0	1.6	1.4	1.3

资料来源:阮西湖,1981:41。

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取得独立的各原加盟共和国都兴起了“语言民族化”的运动,俄语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受到排斥。但是在这些国家里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人(有的高达总人口的36%),这些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最初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潮过了之后,这些国家清醒的政治领袖们即开始认识到,作为交流语言工具,俄语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在1997年12月13日庆祝哈萨克斯坦独立六周年大会上,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特别谈到了语言问题。他指出,在哈萨克斯坦决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族人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是哈萨克人的财富,^①要从正面和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一点。

3. 南非的语言政策

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统治下的南非,英语被认为是白人的语言,种族主义政府也曾制定政策允许黑人进学校并使用自己的语言。“南非政府支持(黑人)通过自己的母语来接受教育,但是许多南非黑人希望用英语接受教育,因为他们认识到,‘在主要城镇之外并只使用部落语言开展教育的语言政策,很清楚的是这样一种设计,使得在实行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也要保证社会分层,即保证黑人不可能学习英语这种技能,而这种技能是争取更多资源所必须的条件。’换言之,这种语言政策将使白人的优越地位永久保持下去。”(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7)

正当其他许多国家的劣势族群积极争取使本族语言成为学校教学语言,积极争取设立本族自己的学校时,南非的黑人却在积极争取使自己进入使用英语的学校,希望通过学习英语教材掌握现代国家行政人员、专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语言交流工具。因为在南非,掌握英语是在城镇就业和取得较好职位的必要条件,不会英语和没有用英语接受教育就会被白人政府以充分的理由拒绝录用,也就意味着被排斥在城镇社会和“白领阶层”之外,而所有的黑人都希望在城镇找到地位和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在南非,语言成为“阶级”的标志。而在其他国家,在“社会分层”系统中进入较高层次的要求并不直接与语言能力挂钩,语言也并没有成为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少数族群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在一些国家还受到法律的保护,各个族群、各个语言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自己的“小社会”和内部的“社会分层”。这样,这些国家的少数族群学习本国主要族群语言的动力也

^① 参见《参考消息》1997年12月15日俄通社和塔斯社消息。

就不会像南非黑人要求学习英语的动力这样强。

4. 瑞士的语言政策

瑞士在处理族群关系方面被公认是一个典范的国家,因为文化多元主义在瑞士各个族群当中得到普遍的认同,瑞士因而不被认为是一个“多数族群—少数族群共存的社会”(a minority—majority society),而只简单地是一个“具有文化差别性的社会”(a culturally differentiated society)。瑞士社会把本国的族群差异仅仅看作是“文化差异”,而不赋予族群差异以任何其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意义。

瑞士的人口中德裔为多数,法裔和意大利裔虽然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仍然保持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征,同时他们也没有感到自己是“少数族群”,他们与德裔和其他族群一起,共同认同于“瑞士公民”这个身份。因为瑞士作为一个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性很强,这个统一性压倒了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Simpson and Yinger, 1985: 17)同时,瑞士也是世界上惟一把国内各族群语言都定为“国语”的国家,瑞士的高中学生都要学习三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所有语言都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哈经雄、滕星, 2001: 183)

5. 我国的语言政策

中国有 56 个族群,使用的语言大约有八十多种。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令规定,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这里需要注意,少数民族所具有的不仅是“使用”本族群语言的权力,而且还有“发展”本族群语言文字的权力。

语言平等是族群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政府为了帮助各个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族群的语言文字,在解放后建立了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机构。1951年,政务院决定:“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马寅, 1981: 17)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前苏联建国后为少数民族创造文字政策的影响。

1956年,国家组织了有七百多人参加的七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在 16 个省、自治区对 33 种族群语言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工作,之后又根据各族群“自愿自择”和有利于本族群发展繁荣的方针,在民族语言方面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帮助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傣、黎、佤和纳西这十个族群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2)帮助傣族在西双版纳、德宏两大方言区傣文的基础上,设计了两种傣文改革方案;(3)帮助景颇族、拉祜族改进了原有的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4)帮助原来使用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马寅, 1984: 17)

在使用方面,政府也有具体的规定:(1)族群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把本族群的语言作为主要工作语言之一;(2)各自治地方人大选举时,使用当地族群语言;(3)在少数民族地区用当地族群语言文字进行审判或发布布告和文件,各族群成员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4)有本族群通用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学校里注意使用当地族群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5)在有条件的自治地方,建立使用本族群语言文字的新闻、广播、出版事业。(马寅, 1984: 17~18)

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在 50 年代由中央政府组织语言专家创制的。四十多年来,这

些“新文字”的使用情况如何?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些“新文字”?有多少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习这些“新文字”?需要结合几十年来“新文字”的推广与使用效果以及出现的问题,对当年这项工作进行总结与反思,这对于制定今后中国的语言政策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今后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

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和聚居地区,都建有以这些族群语言为教学语言的“民族学校”。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展了大规模的双语教育实验。学习本族语文有利于扫盲和普及文化,而学习汉语则使少数民族学生掌握这一在中国应用性最广的族际共同语,有利于他们学习知识和未来的就业与发展。对于人口较多、本族语言教学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族群来说,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双语教学将是主要的教育体系;而对于人口很少,没有自己的书写语言(如保安族、撒拉族等)或者书面语言历史很短、应用范围太小的族群来说,汉语将成为主要的学校教学语言。而在地方行政司法系统和公共场合,语言平等将始终是我国的基本政策。关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教育问题,在本章的第七部分还将详细讨论。

四、从语言使用角度分析族群关系的演变

对于族群关系的研究者来说,关于语言及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研究可以向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和帮助呢?

语言对于任何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对于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更是具有特殊的价值。中国是一个地域幅员辽阔、拥有着许多族群的大国,在各个族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长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存在着语言、方言的差别。这些差异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除了需要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之外,我们也应当开展对于各地区、各族群在语言、词汇的交互使用与演变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把调查区域内语言的应用与演变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系统地调查和分析各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格局与影响这一格局变迁的因素。

1. 语言可以反映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水准、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抽象思维的发展水平以及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例如蒙古语中对于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用术语,^①这些词汇在牧业生产和草原生活中用起来远比汉语词汇要丰富、准确、便利得多。如果牧人走失了一匹马,在寻找这匹马的途中,他只需向别的牧人讲几个词就可以清楚地描述这匹马的具体特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蒙古语中关于畜牧业和草原生活之外的词汇就相对比较缺乏,这是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牧业文化在语言中的体现。分析和研究蒙古语的词汇及其演变,无疑会有助于了解蒙古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特色与发展进程。

^①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也详细介绍了努尔人对于描绘牛的颜色和其他特征所使用的非常丰富的专用术语。(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51~57)。

以此类推,沿海的渔业族群对于不同的海洋生物和海潮现象一定也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来进行描述并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这是渔业生产和海上生活的客观需要。其他如农耕族群、狩猎族群、山地族群、沙漠族群等也都有与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传统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词汇体系。调查分析这些语言词汇的内容与领域,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这些族群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与科技水平。

2. 语言之间的借鉴反映出不同族群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它们各自的观念与文化也必然通过这些交流而对彼此发生影响。一个社会对于其他社会、其他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合程度,这是族群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例如蒙古族与汉族有着历史悠久的交往,蒙古语在表达来自汉族地区的物品、用具以及各类政治观念时,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借用了汉语词汇,如拖拉机就直接使用汉语的“拖拉机”的发音,又如手电筒叫“嘎勒灯”,是由蒙古语中的“嘎勒”(手)和“灯”(来自汉语的“灯”,表示能够发亮的东西)两个词连在一起而成。这就是语言使用中的“外来语”现象。这些外来语词汇的使用,反映了蒙古族牧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汇”。

一般来讲,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会比较多地吸收发达民族的词汇,它的知识分子也会比较积极地学习发达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这是推动本民族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是发展本民族科技与经济的需要,也是他们在生活中吸收和使用发达国家物质和精神产品的需要。研究一个民族语言中的外来词汇,调查这个民族成员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是了解分析民族交往态势的重要研究视角。

3. 研究社会流行语言、词汇的变化,是分析社会变迁、族群关系的一个生动视角

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里发生了多次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此期间,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经历了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群在近百年里受到汉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也经历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部分地反映在它们的语言使用当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群在语言词汇使用方面的变化,是理解各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调查多族群地区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词汇变化,有助于分析族群关系变迁。比如我们可以开展对于西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与汉藏文化交融的专题研究。^①西藏地区是我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在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中,藏族占大约97%。在1951年和平解放之前,西藏与内地相对隔绝,文化与人员交流很少,这使得西藏在交通、通讯、教育、经济发展方面长期落后于内地。藏语的词汇也反映出西藏社会发展的状况与汉藏交流的情况。在近五十年里,特别是1959年之后,开始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职工来到西藏工作,西藏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交流

^① 2000~2002年期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周炜博士在北京大学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这一专题就是他的博士后研究专题。他的研究成果以《西藏的语言与社会》为名,已经由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正式出版。

中开始引入汉语词汇,学校里开始讲授汉语课程,许多城镇的年轻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部分人甚至开始学习英语。因此调查和研究西藏城乡居民的汉藏语言使用情况,无论对于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西藏与内地的政治整合、经济交流、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发展历程,还是研究汉藏关系的演变,都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西藏之外,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也需要开展类似的语言学习使用情况的调查,作为我们分析族群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是可以采用量化的方法来测度和分析的,族群关系好不好,可以通过调查不同族群的成员之间学习和使用其他族群语言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专题,可以与居住格局、族际通婚、社会网络等其他几个族群社会学研究专题的调查结果相互比较和印证,从而向我们展示一个地区族群关系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势。这些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逐步展开,先从微观社区(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城市)的调查研究入手,逐步扩展到一个省乃至全国。

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而言,外部的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内部的社会—政治格局、各种社会流行思潮等都交汇在一起,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社会中语言词汇的使用与创新。要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研究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实在不应该忽视这个研究视角和生活中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

五、近年来我国族群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族群语言使用方面组织了一些调查研究。90年代,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在内蒙古、西藏等地区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了当地各个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调查的结果。

首先介绍我们在内蒙古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语言调查情况。我们发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各个地区,语言的使用情况几乎是一边倒,无论是自治区首府城市,还是地区、旗县和乡镇,主要是蒙古族学习使用汉语,很少有汉人去学习蒙古语。在拉萨,情况也是如此,藏族普遍学习使用汉语,而汉人极少学习藏语。

这种语言学习模式与50年代初期的情况很不一样。在解放初期来到蒙古族地区特别是到基层工作的汉族、回族、满族职工当中,学习蒙古语的热情很高,政府专门印制了蒙古语学习读本,鼓励职工学习蒙古语言文字。西藏的情况十分相似,50年代初期十八军入藏时,中央出于对西藏民族问题的关注,要求各连队都要配备藏语翻译,同时要求在藏工作的干部、工人、士兵都应学习说简单的藏语,也要求主要领导干部通晓藏语。所以那时候在藏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学习藏语的热情很高,甚至在很多场合主动使用藏语。到了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虽然汉语、藏语都是官方正式用语,但实际使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反映出藏族地区族群关系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内蒙古农牧区居民的语言能力调查

表3是我们在1985年赤峰调查中所获得的关于户主语言能力的调查结果。可见在农业地区,96%的蒙古族户主会讲流利的汉语,同时有34%的蒙古族户主已经完全不会讲蒙古语了。而在牧业地区,有47.2%的汉族户主至少可以讲一些蒙古语,其中26.8%

的汉族户主蒙古语甚至讲得很好,同时精通汉语的蒙古族户主比例也达到了73.2%。由此可见,在农业地区,汉语是通用的语言,汉族基本上无人学蒙古语,而蒙古族普遍学习汉语,蒙古语仅在不到一半的少部分蒙古族居民中使用;而在牧业社区的蒙古族内部,蒙古语依然是主要语言,但是在蒙汉居民之间进行交流时,汉语和蒙古语是同时并用的语言,所以同时存在着汉族学蒙语、蒙古族学汉语的现象。但是如果蒙古族牧民去本社区之外的城镇、农区与人交流时,就必须使用汉语,所以牧区蒙古族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比汉族学蒙语的积极性要高得多。而无论农区还是牧区,蒙古族被访者几乎一致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在语言上能够蒙汉兼通。

表3 内蒙古赤峰农牧区被调查户主的语言能力(1985年)

		农区		牧区	
		汉族	蒙古族	汉族	蒙古族
汉语	完全不会	0.0	0.0	0.4	6.8
	会一些	0.2	3.7	0.7	20.0
	很好	99.8	96.3	98.9	73.2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蒙古语	完全不会	89.1	34.0	52.8	2.1
	会一些	8.3	22.5	20.4	3.8
	很好	2.6	43.5	26.8	93.8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马戎、潘乃谷,1988:80。

2. 西藏城乡居民语言能力与使用情况调查

1988年夏季,我们在西藏自治区的三个地区组织了一次一千三百多户的抽样户访问卷调查,在问卷中专门包括了有关语言使用与学习情况的问题。表4介绍了被访户主语言能力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

在拉萨老城区被访户主中藏族占98%,所以被访者中有98.9%的人藏语很好,其余1位汉族户主和13位回族户主也多少会讲一些藏语。但是这些藏族户主中藏文很好的仅占14.1%,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因而完全不会藏文的占到67%。拉萨城区居民接触汉族和汉语汉文的机会与农村居民相比要多一些,所以有10.2%的户主汉语很好,20.3%的户主能讲一些汉语,但汉文很好的仅有2.7%,会一些汉文的占7.1%,完全不识汉文的占90%。这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城市的情况差别很大。拉萨市城关区汉族人口只占28%,而其他自治区首府城市居民中汉族都占大多数,而且在拉萨市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居住隔离,影响着汉藏居民之间的日常往来。(马戎,1996:406~407)由于拉萨市大多数市民与汉族接触较少,又不识汉文,所以无法通过汉文印刷品了解、接受政府的政策、观点和提供的各类信息,这一个特点是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的。

表4 西藏自治区被访城乡居民户主语言能力(1988年)

		拉萨	各乡	总计	
		%	%	户数	%
藏语	完全不会	0.0	0.1	1	0.1
	会一些	1.1	0.8	12	0.9
	很好	98.9	99.1	1292	99.0
	合计	100.0	100.0	1312	100.0
藏文	完全不会	66.9	78.5	955	72.8
	会一些	19.0	14.0	216	16.5
	很好	14.1	7.5	141	10.7
	合计	100.0	100.0	1312	100.0
汉语	完全不会	69.5	90.4	1051	80.1
	会一些	20.3	9.1	192	14.6
	很好	10.2	0.5	69	5.3
	合计	100.0	100.0	1312	100.0
汉文	完全不会	90.2	97.5	1232	93.9
	会一些	7.1	2.0	59	4.5
	很好	2.7	0.5	21	1.6
	合计	100.0	100.0	1312	100.0
公共场所 使用主要语言	藏语	100.0	99.7	1310	99.8
	汉语	0.0	0.3	2	0.2
家庭使用 主要语言	藏语	100.0	100.0	1312	100.0
	汉语	0.0	0.0	0	0.0

资料来源:马戎,1996:369。

相比之下,在西藏调查的各乡农牧民户主^①中只有1位汉族户主不会藏语,有72.8%的户主完全不懂藏文,藏文很好的户主占7.5%,完全不懂汉语的户主占90.4%,汉文很好的户主仅占0.5%。所以西藏农牧民通过阅读汉文、藏文书籍来学习现代农业、副业技术的能力普遍是很弱的。

被调查的户主们表示,他们在公共场合和家中,使用的语言都是藏语。在被调查的老城区户主中,有85.5%的户主,四周邻居都是藏族,汉族在邻居中有多数的仅有0.6%的户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汉族邻居接触的机会不多,但是完全不懂汉语的是极少数。在各乡调查的情况大致相同。

^① 1988年在我们于各乡调查的668户中,除7户汉族外都是藏族。

尽管在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方面强调自己只说藏语,可是拉萨老城区居民中与汉族经常交往的占 73.8%,感到需要学习汉语文的占 79.2%,认为西藏的发展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的占 79%,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兼通汉藏文的占 93.8%。(表 5)这说明老城区居民大多数对学习汉语文是很积极的,这是今后发展汉语文教学的群众基础。虽然各乡农民中的大多数(73.2%)平时与汉族很少接触,但他们中感到需要学习汉语文的人的比例(85.9%)甚至高于拉萨,认为西藏今后的发展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的占 94.3%,高于拉萨的 79%。可见农村由于文化教育相对落后,对汉语文教学持一种更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有些人在强调藏语文教学的同时,提出要压缩现有的汉语文教学,其实这种主张并不一定符合城乡广大藏族居民的愿望。

表 5 西藏自治区被访户主关于汉语、藏语学习方面的看法

		拉萨		各乡		总计	
		户数	%	户数	%	户数	%
平时是否经常与汉族交往	经常交往	288	73.8	52	26.8	340	58.2
	不常交往	102	26.2	142	73.2	244	41.8
	合计*	390	100.0	194	100.0	584	100.0
是否感到需要学习汉语文	需要	403	79.2	488	85.9	891	82.7
	不需要	106	20.8	80	14.1	186	17.3
	合计	509	100.0	568	100.0	1077	100.0
西藏发展是否需要提倡学习汉语文	需要	381	79.0	547	94.3	928	87.4
	不需要	101	21.0	33	5.7	134	12.6
	合计	482	100.0	580	100.0	1062	100.0
对目前中小学藏语文教学水平的评价	很好	149	36.3	179	32.2	328	33.9
	中等	206	50.1	300	54.0	506	52.3
	及格	43	10.5	58	10.4	101	10.4
	很差	13	3.1	19	3.4	32	3.4
	合计	411	100.0	556	100.0	967	100.0
对目前中小学汉语文教学水平的评价	很好	125	30.4	158	30.0	283	30.1
	中等	177	43.1	281	53.3	458	48.8
	及格	89	21.6	49	9.3	138	14.7
	很差	20	4.9	39	7.4	59	6.4
	合计	411	100.0	527	100.0	938	100.0
对自己孩子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希望	藏语为主	8	1.6	67	12.5	75	7.1
	汉语为主	24	4.6	23	4.3	47	4.5
	藏汉兼通	487	93.8	446	83.2	933	88.4
	合计	519	100.0	536	100.0	1055	100.0

* 由于部分被访户主对一些问題未做回答,所以各项问題回答者的合计总数不完全相同。

资料来源:马戎,1996:372。

各乡被访户主中有 83.2% 的户主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藏汉语兼通,这一比例低于拉萨。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他们对目前农村小学汉语教学的评价不高。各乡户主认为当地学校汉语教学水平“很差”的占 7.4%,但是评价“很好”的也仅占 30%。拉萨城区的汉语教学水平要稍高一些,对之评价“很差”的占被访户主的 4.9%，“很好”的占 30.4%。拉萨城区和各乡户主对目前中小学藏语教学水平的评价大致相同,认为“很好”的占 32%~36%，“很差”的占 3.1%~3.4%，“及格”的占 10%，“中等”的占 50%~54%。西藏城乡中小学校的藏语和汉语的教学仍然面临进一步提高质量的任务。

六、族群语言与少数民族教育

1. 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

建国后,我国政府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为一些原来没有文字的族群创造了新文字,这一做法的政治意义和心理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可是从文字的应用性来看,这些新创造的文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没有任何以前的文本资料和出版物可供阅读,以这种新文字书写印刷的材料也没有几个人会看,把它们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和文字,可以说对于学生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徒然浪费了他们的时间,耽搁了他们的学业。如果一些族群人口规模太小,那么他们即使有一定使用历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形不成学校教育和实际应用的规模,这些语言文字最后也只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有时,一种语言既可增强一个族群的凝聚力,也可能会阻碍这个族群的发展,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这就像一些族群的传统服装、使用器物一样,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和国际通用化,必然会走向消亡。^①所以,一方面,对于仍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当从立法上确保其合法性,对于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要求,政府应当给予全力的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到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学生未来的发展,儿童在入学时应当允许有选择学习语种的权力,不应采取强制性规定来要求少数民族学童必须选择本族群语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人口规模较小、语言应用范围小的族群来说,从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学习汉语的积极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而对于一些人口规模大、族群文化历史悠久的大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族群语言在广大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应用性,要看到学习本族群语言对于该族群发展教育和经济的积极意义,对于族群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学校中的使用,对于族群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都必须给予相当的重视,否则,正像列宁警告过的那

^① 有些动植物也在自然灾害和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这个进程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开辟一小块“保护地”来维系珍稀物种的延续,以取得生物多样性的基因;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如采用这种做法以延续其文化,那么对他们是否公平和人道,都是值得考虑的。

样,使用行政手段推行“国语”的做法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列宁,1913b:500)^①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对列宁反对“民族文化自治”的观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在《民族问题提纲》的第七条中,列宁非常明确地指出:“‘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则在教育(或者整个‘文化’)事业上宣扬民族的隔绝,但隔绝是同保持一切(其中包括民族)特权的基础完全符合的。”(列宁,1913a:241)过分强调“民族语言”在公共事务和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客观上也将会起到“民族隔绝”的效果,不利于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使用行政力量来强制性地少数族群地区推行一种“国语”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通过“民族自治”的行政安排在学校里过分强调当地族群语言的做法也可能产生消极效果。

2. 少数族群在语言学习方面的不同情况

在表6中,我们试图来分析一下在一个国家内,少数族群语言在实际应用方面的几种情况:(1)从来没有独立文字、人口很少的族群,其语言在本族民众的基层社区(村落)中仍然有交流信息的功能,但是到了有其他族群成员的城镇,就连这个功能也很弱;(2)有独立文字的族群,包括人口规模较小以及人口达到百万以上的族群,其语言在当地基层社区广泛使用,在城镇里仍可以部分使用,但到了其他族群地区就起不到交流工具的作用。

关于族群文字的实际应用方面,在表6中被大致分为四种情况:

(1)从来没有独立文字、人口很少的族群,政府为他们创造的“新文字”实际上不发挥任何学习、交流的功能,仅仅是“民族平等”的某种政治象征,没有任何实质的应用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双语教学”。

对于有独立文字但人口规模大小不等的各族群,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

(2)对于有自己文字,但是人口在百万以下而且没有形成使用自己文字的教学体系的族群,考虑到文字的实际应用性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除非本族群强烈坚持,不宜花费很大人力物力来重新建立使用该文字的教学体系。但是在小学教学期间,当地族群的语言可以作为教学的辅助语言。同时在研究语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应当设立相应的专业,使少数研究人员可以学习和研究这些正在消失中的语言和文字。

(3)对于有独立文字、人口较少而且没有形成以本族语言文字为教学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族群,其文字的出版物内容与数量既不能满足在校学生的学习要求,更无法满足本族知识分子学习与阅读的基本需要。由于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成为当地社会普遍通用的文字,明显地缺乏实际应用性,似乎不应成为大多数学童的教学文字。但是如果该族有部分民众要求以本族文字为学校教学语言,则应当根据民众的愿望编制教材,并在部分专设的学校里为那些愿意学习本族文字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条件。

(4)对于一些已经形成以本族语言文字为教学语言的完整教育体系的人口较多的族群(如我国的朝鲜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来说,其文字出版物可以满足本族青少

^① 这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无数的例子,如西班牙的“佛朗哥对加泰隆人语言及文化的镇压反倒扩大并加深了两者的影响,因为人们的抵抗自然集中在对他们私有领域的保护上。”(史密斯,2002:85)

年学习知识的基本需求,但是信息量与前沿性仍然有限,这些族群的知识分子仍然需要阅读汉文或外文出版物来学习和吸收现代社会的各种最新知识与信息。这些族群的学生们在学校里使用哪种教学语言,政府应当提供两种选择的机会,同时应当完全尊重学生和家长的自愿选择。

表6 族群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学习功能分析

族群分类	语言			文字			
	本地基层 社区交流 功能	本地城镇 社会交流 功能	其他族群 地区交流 功能	双语教学 辅助语言	双语教学 主要语言	基本阅读 学习功能	有效阅读 学习功能
有语言无文字小族群	√	×	×	×	×	×	×
有文字,人口百万以下	√	√-×	×	√	√-×	×	×
人口百万以上但无本 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	×	×
人口百万以上,已有本 族语言完整教育体系	√	√-×	×	√	√-×	√	×

√:表示具有较强功能;√-×:表示具有部分功能;×:表示基本上没有功能。

以上仅仅是对语言文字应用程度的一个非常粗略的归纳。由于各个族群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归纳可能很不全面很不确切,究竟应当如何来分析语言的实用性,今后还需要不断开展讨论与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表6主要是从语言文字作为工具的应用性效度的角度来分析的。任何语言(不管其是否有文字)都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留下的宝贵遗产,即使不作为学校的正式教学语言,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仍然应当开设相关语言的学习与研究课程,以免这些语言完全失传。这与面向社会全体青少年的学校教学的性质是不同的。学校教学考虑的是语言文字的实质应用性,目的是为了使下一代能够有效地学习最新的知识,能够有效地与他人交流。而对于一些应用性很低的语言文字的学习与研究,只是少数语言学专家学者的的工作。这两者是不应混淆的。

3. 少数民族学生对于族际共同语言的学习

也许有些人会说,与汉族、回族、满族这些以汉语为母语的族群相比,其他族群的学生在学习上就吃亏了,因为他们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汉语文。事实确实如此,这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所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况。在地理分布上,有的族群居住在沿海平原,有的族群居住在沙漠高原,夏威夷土著人生活在世界上气候最好的太平洋岛屿上,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北冰洋的冰天雪地里,后者是不是吃亏了呢?这个世界上从自然资源和文化地位的分布来看,是存在着“幸运的”族群和“经历磨难的”族群。世界上没有完全平均的事,不平衡是自然界的常态。抱怨是毫无意义的,应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种不平均,通过奋斗来争取“幸运的”结果。在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中,即使在自然资源

和文化地位上处在“幸运”位置的族群，如果不努力奋斗，那么也可能在与其他族群的竞争中转变为“劣势”族群。夏威夷土著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太优越了，所以没有动力去发展生产力，最后家园沦为殖民地而且作为独立族群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多学一种语言吃亏”的命题。例如中国留学生到一所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去留学，他们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去掌握英语，而且可能到毕业时的英语水平仍然明显低于美国人。但是由于他们来自一个与美国社会不同的具有另一种文化传统的社会，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当他们在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进行比较，从而能够提出美国学生提不出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中国学生的课程作业和完成的学位论文，从英文水平上看绝对不如美国学生，但从思想深度、学术价值来看完全不会低于美国学生。所以掌握另一种语言以及熟悉相关的一个社会与文化传统，对于学习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来说，使他在思考深度和比较研究的能力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可能完全抵消需要学习掌握一种新语言所带来的劣势。

如果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是进入到普通大学里与美国学生同堂上课、共同学习和一起讨论、一起考试，而是在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里用汉文听课，那么他们无疑可以减轻学习英语的压力，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也因此大打折扣，他们的成绩也失去了与美国学生的可比性，毕业后也完全没有在美国或国际机构就业的机会。如果我们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处在类似的以本族语言为主的学习环境和考评体系当中，他们毕业后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其他学生进行竞争呢？

4. 学校中的教学语言

尽管人们都能够隐约感觉到语言的两重性，认识到语言的应用性价值，但是由于不同的指导思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族群政策下，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也会出现不同的模式。

美国社会学家在讨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语言政策时，曾经指出英语在南非是获得更多资源所必须的“技能”。在南非社会，各类行政、经济、文化部门和机构中所使用的语言都是英语，英语是应用性最广泛、效度最高的交流与学习工具。南非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各类私有和股份企业的雇主有权决定招雇员工，而不必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制约。所以不掌握英语和没有用英语接受教育，缺乏英语这一必需的交流工具和技能，就自然被排斥在绝大多数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的就业市场之外，也就是不能接触到这些重要的“资源”。因此黑人们极为痛恨南非政府不允许他们用英语接受教育的语言政策。

而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民族政策的环境下，近二十年来，由于政府一直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的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所以极力强调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和作为学校教学语言的重要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各种公开场合十分强调本族的语言必须作为教学语言，但出于对自己孩子未来发展前途的实际考虑，又私下把孩子送到汉文学校去读书。（刘庆慧，1989：502）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是，在强调民族语言的氛围下，一些从来没有学习过本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年轻干部，在工作以后又开始自学在本人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缺

乏实际应用性的本族语言，其目的是通过掌握本族语言而争取族群认同，从而有可能作为本族代表而得到职位的晋升。一个年轻的少数民族干部如果通晓本族语言，他的晋升有可能得到本地汉族和本族领导的双重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并没有多少应用性，而是成为某种特殊的“族群象征”。这一象征由于有助于一个人建立与本族其他重要成员的认同，有助于一个人使自己成为本族群的代表而具有功利性，也就变成具有特殊实用意义的“工具”，但是并不是相互交流信息的工具，而是促进群体身份认同的工具。

总的来说，根据我国法律，只要本族群有要求，政府就应当以其文字为内容开展双语教学，编印该文字的课本教材，这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应当允许学童及其家长自愿从以下两种教学语言体系中任选一种：（A）以本族群语言文字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学习汉语文；（B）以汉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学习本族文字。在这两种体系中，本族群语言都可以作为教学辅助语言，这种辅助作用的正面效果对于小学低年级学生尤为明显。

世界上许多多族群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双语教学，根据各国国情采取不同的模式。（哈经雄、滕星，2001：181～194）我国自1949年前就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学校开展了双语教学，建国后全面发展少数民族学校和双语教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许多族群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本族群文字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对于一些社会经济发展较慢、过去没有现代教育体系的族群来说，双语教学的学习效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各级学校在教学语言上不配套，初级教育用本族语言教学，但较高级程度的教育仍不得使用汉语文，这样就造成学习的脱节。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系统和高质量的本族语文的教材。例如西藏自治区中学藏语授课情况较差，除了缺乏藏族教师之外，数理化等科目尚没有系统完备的藏语教材与辅导读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西藏过去没有现代学校教育，没有现代学术科目的教材，要翻译、编辑一整套高质量的中学、大学各科目教材，决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缺乏高质量的教材和高水平的专业教师，从而导致教学质量差、学生水平低，这是目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我国的中小学汉文数理化教材，经过近百年来无数教师、专家的多次编写修订才达到今天的水平。有些人口较少、专业知识分子队伍小、教材编写历史短的族群，以这些族群的文字编写的数理化教材如要达到汉文教材的水平，不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可以做得到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人员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各级少数民族学校的双语教学和加强汉语学习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大学里的理、工、医、农和社会科学各学科和专业应当向所有的学生（包括少数民族学生）提供用汉语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开设的课程。少数民族的学生也有权利自己选择是用汉语还是用本族语言学习这些课程。我国的宪法和社会都承认各个族群的语言文字的合法与平等地位，但是在政治平等的意义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应当从应用性的角度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究竟在

学校里使用什么语言教学对于学生未来的就业与个人发展最有利。^① 如果适当淡化政策因素, 少数民族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发展的实际需要来选择语言的学习。

5. 中国语言使用的基本格局

目前中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说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各个族群有权利保存与发展自己的语言, 这是基础层面上的“多元”。同时为了各族群之间的交流,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发展国内的物资和劳动力市场, 早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体中国人需要一种语言作为全国通用的“族际共同语”。从人口的规模、语言使用的历史发展和现实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 这个“族际共同语”只能是汉语文。同样, 汉族各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各自的方言, 但在学校和公共领域则需要推广“普通话”。现在我国双语教学一般多强调各族语言的平等与“多元”, 对于“一体”即在平等基础上因客观发展而需要一种“族际共同语”则强调不够。

当我们分析如何选择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时, 从“多元”的一面来看, 在那些汉语尚不通行、学生从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就业的少数民族地区, 应在教学中以本族群语言为主, 同时开设汉语文课; 而在有条件普及初中的地区, 需要及早开设汉语文课, 要考虑到中学生们未来的发展前途, 要加强双语教学, 提供用汉语讲授的数理化及其他课程, 要在学校教学中体现出“一体”的这一个方面。

现在中国扩大了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文化、学术交往, 许多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 中国的企业也进入其他国家。这些在业务和人员交流中涉外的企业所需要雇佣的人员, 熟练掌握英语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这一需求, 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 已经在大力发展英语教育, 提倡使用英语来讲授各类专业课, 这是在“跨国”劳动力市场中努力提高中国学生竞争能力所必要的措施。这与现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需要提高汉语文水平, 是一个道理。

判断在一些具体地区或族群中实行的双语教育体制是否符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 群众的意愿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选择用什么语言接受学校教育, 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我们应当尊重大多数群众的实际要求。在正常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下, 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反映出来的是语言的实际应用性和他们的就业考虑。作为政府和学校管理部门, 应当及时调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 调查学生与家长对于选择学习专业和教学语言的意愿与发展趋势, 及时根据市场和学生的需求进行调整。

为了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中国的各个族群都必须在教育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方面加紧努力。当今世界上的竞争, 说到底人才的竞争。语言是学习的工具, 是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接受校外信息的工具。我们在前面讲过, 语言

^① 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 用少数民族语言开设的各类课程所使用的用本族语言表达的学术术语, 除了部分借用通用语言谐音来表达的部分词汇(外来语), 与其他语言之间无法相互沟通, 客观上对于学生与其他族群人员在学习和日后工作中的交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障碍。

具有双重性，既是代表一个民族传统并融进民族感情的载体与文化象征，又是学习知识和对外交流的工具。在全世界所有的族群都不得被卷入的严峻竞争大潮中，在涉及学习国内“族际共同语”和世界“国际共同语”的问题时，理性应当胜过感情。

七、结束语

由于语言既是一个族群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人民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相互进行交流的工具，所以在衡量当前的族群关系或分析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时，关于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分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

本文首先介绍了民族语言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以及分析语言与族群关系的主要文献，然后从七个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第一部分强调了语言在文化象征和交流工具方面所具有的双重性，前者带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感情色彩，后者则把语言完全看作是功利性的交流与学习工具。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的功利性有所加强。

第二部分介绍了在我国很有影响的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语言”的观点以及前苏联在语言使用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马列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马列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来自于革命实践，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语言现象与语言政策问题仍然有指导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介绍与讨论了我国建国以来的语言政策。语言政策作为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许多少数族群干部与知识分子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应当说有许多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与反思。

第四部分讨论了如何通过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来分析社会文化变迁和族群关系的演变。由于语言表现了各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语言之间的借鉴生动地反映出不同族群在各方面的交流与融合态势，所以研究各族群流行语言、词汇的变化，是分析族群关系的一个生动视角。

第五部分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大学在我国一些少数族群地区开展语言使用调查的一些调查结果，分析了内蒙古和西藏城乡居民语言使用和语言学习的基本态势。这些调查结果反映了建国以来一些地区语言学习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

第六部分结合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来讨论我国少数族群教育的发展情况。建国后我国各少数族群自治地方都设立了少数族群学校，培养少数族群人才，在这些学校里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在这一部分里讨论了对于这一教学模式的总结和少数族群学校的发展趋势。

语言是族群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在族群的形成与演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语言的相互学习是族群交流的必要条件，语言使用的发展趋势也预示着族群交往与族群融合的发展潮流。

参考文献(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1] A. 史密斯.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 [2] L. 卡瓦里—斯福札. F. 卡瓦里—斯福札. 人类大迁徙 [M].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2000.
- [3] S.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 [4] 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 [5]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国家民委经济司编. 中国民族统计 [Z].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 [6] 哈经雄. 滕星. 民族教育学通论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7] 冀殿义. 对民族院校办学指导思想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A]. 耿金声. 王锡宏主编. 民族教育改革与探索 [C].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 [8] 姜亚军. 疯狂的英语 [J]. 书摘, 2002(12): 63~66.
- [9] 列宁. 1913a. 民族问题提纲 [A]. 列宁全集 [C] 第1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236~244.
- [10] 列宁. 1913b. 给斯·格·邵武勉的信 [A]. 列宁全集 [C] 第1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500~503.
- [11] 刘庆慧. 西藏基础教育与藏语文教学 [A]. 耿金声. 王锡宏主编. 民族教育改革与探索 [C].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492~507.
- [12] 马戎. 西藏的人口与社会 [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1996.
- [13] 马寅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14] 宁骚. 民族与国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15] 阮西湖编译. 苏联民族人口问题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1.
- [16] 斯大林. 1929. 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 [A]. 斯大林全集 [M] 第1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286~305.
- [17] 斯大林. 1950.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A]. 斯大林文选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520~559.
- [18] 西藏自治区民族教育科学研究所. 关于西藏建立以藏语授课为主的教学体系初探 [A]. 耿金声. 王锡宏编. 西藏教育研究 [C].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290~306.
- [19] Bass C. 1990. 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 [20] Connor, W.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1] Dreyer, June T. 1976. China's Forty Mill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rsons Talcott, 1975.
- [22] Simpson, George E and J. Milton Yinger, 1985.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fifth ed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 [23]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收稿日期] 2003-11-25

[作者简介] 马戎(1950~), 男, 回族,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1

缀璫。载欣载语双鸂鸟，质傅铅花光皎皎。雄雌并立清飙前，贞静幽闲一何好。多情尤有白昼眉，双眉画得天然殊。从今京兆多才思，对此应惭画不如。盆地一物龟相类，出没清波名玳瑁。锦鳞日映光陆离，谁数南溟紫文贝？^①可惜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得以参观这样的“动物园”，不然，中国的园林史上将有更光辉的扉页。而由皇帝一己私欲的满足到遍及臣庶的“公共”福利，狮子等禽兽的进口可能会有更多的支持者了。

[收稿日期] 2003-08-04

[作者简介] 王 颢 (1952~)，男，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广州 510632
屈广燕 (1979~) 女，暨南大学古籍所硕士研究生。广州 510632

Roaring Beasts in Bulrush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ing and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by Means of Presenting Lions

Abstract: It was a remarkable one among the diplomatic event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the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presenting lions. The emperors had got the animals from Heart (Halie) at first and then Samarkand, Shiraz, Esfahan, Hormoz, Konya (Lumi), Aden and Makkah (Tianfang). The quantity of the beasts and frequency of the contribution was so large that came out top in Chinese history in middle ages. The people living in Ming times described the figur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lions factually and lively because most of them had seen them by themselves. There were more serious financial and diplomatic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courses of lion presenting and it was prais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Yongle-Xuande by the officials in the court but was criticiz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Tianshun-Jiajing.

Key words: lions,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the Ming Danysty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Ma Rong

Abstract: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all kinds of ethnic groups, but also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o it becomes the symbol of the ethnic group to some degree.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can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thnic groups. This article concerns with the language policies of some nations, the language use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 and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discussing the educational pattern and trend of minorities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languages in school.

Key words: language;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P. 20)

^① 夏原吉. 夏忠靖集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弘治刊本, 页 670 下、671 上、下.